

对里耶秦简中捕猿进献的探讨

王 勇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向朝廷进献地方特产,在古代中国是地方顺服的象征。秦代迁陵县进献的物产种类很多,猿就是进献的地方特产之一,捕猿进献是迁陵每年都进行的常规活动。在秦王朝起初控制的范围内,迁陵所在的洞庭郡是猿分布最为密集,猿名气最大的地区之一,这应是迁陵每年捕猿进献的原因。由于猿较少下地活动且行动相当敏捷,当时捕猿并不轻松,迁陵捕猿需由官吏带队围捕,每次动用的人力亦比较多。但从迁陵捕猿的情形判断,进献物品的置办主要是使用官有劳动力,负担本身也不是特别重。进献在当时应该是地方政府负责,而非普通百姓的法定义务,其费用由地方财政支出。

【关键词】迁陵;捕猿;进献;里耶秦简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4-0003-08

A Discussion on Catching Apes for Offering in Liye Bamboo Slips of Qin Dynasty

WANG Yo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Offering local products to the court was a symbol of local obedience in ancient China. Qianling offered many kinds of goods in Qin Dynasty. Among them, Catching apes for offering was a routine activity carried out every year in Qian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initial control of the Qin Dynasty, the Dongting prefecture where Qianling was located was one of the areas with the densest apes distribution and the most famous apes. This is probably the reason why Qianling county captures apes every year. Because the apes were less active in the ground and their actions were quite agile, it was not easy to catch apes at that time. Catching apes was led by officials and mobilize a lot of manpower each time in Qianling. But judging from the situation of ape catching, the purchase of these tributes was mainly using state-owned labor, and the burden itself was not particularly heavy. The contribution should be a legal obliga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not ordinary people. The cost is pai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Key words: Qianling County; catching apes; offering; Liye bamboo slips of Qin Dynasty

向朝廷进献本地土特产的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关于方物进献的研究是农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秦代迁陵县进献的物产种类很多,猿就是进献的地方特产之一。《里耶秦简》(壹)出版后,其中的“捕鸟”“捕羽”简很快引起学者留意,并撰文探讨猎捕禽鸟的用途、性质及背后的民俗文化生态条件。而从里耶秦简的记载看,捕猿尽管不如猎捕禽鸟普遍,其实也是秦代迁陵每年都进行的常规活动。由于里耶秦简中的捕猿简数量相对较少,目前学界对此给予的关注亦不多,只是在论述迁陵的“进献”时

[收稿日期] 2020-11-03

[作者简介] 王勇(1975-),男,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农史研究。

有提及^①。不过,里耶秦简中的“献”究竟是何种性质,学者间仍存在意见分歧。鉴于此,本文试图讨论秦代迁陵捕猿进献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就学者对迁陵进献性质的认识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迁陵官府组织的捕猿

里耶秦简9-31载:“廿八年二月辛未朔庚寅,貳春乡守行敢言之:廿八年岁赋献黄二、白翰二、黑翰二、明渠鸟二、鹭鸟四。令令乡求捕,毋出三月。乡毋吏、徒,行独居,莫求捕。捕爰用吏、徒多。谒令官有吏、徒者将求捕,如廿七年捕爰,乃可以得爰。敢言之。(正)仓□已付。……二月戊戌□□□□□□□士五(伍)程人以来。除半。行手。(背)”^②这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迁陵县貳春乡守行给县廷的文书。里面提到迁陵县在秦始皇二十八年要“赋献”的动物数量,其中“黄”后面,因为诸鸟并列,有可能是漏了“翰”字,指黄翰、白翰、黑翰、明渠各两只,鹭鸟四只。但由于后文强调捕爰,这里也有可能是漏掉了“爰”字,指黄爰。简文中的“捕爰”,《校释》指出“爰,疑通‘猿’,亦作‘猿’,猿猴”。并引《汉书·李广传》“为人长,爰臂”,颜注引如淳曰“臂如猿臂通肩也”,《史记·李将军列传》作“猿臂”为证^③。“捕爰”即是捕猿(猿),而“黄爰”是指黄色毛皮的猿。里耶秦简9-3311载:“貳春乡黄爰皮一,黑爰皮二。”《山海经·南山经》“(堂庭之山)多白猿”,郭璞注“今猿似猕猴而大,臂脚长,便捷,色有黑有黄”^④。猿虽有其它颜色,却以黄、黑两色居多。

秦始皇二十八年,迁陵县令让貳春乡负责捕捉要进献的禽兽,但貳春乡守行觉得完成任务有困难,因为乡里的吏、徒不足,他又特意提到捕猿需要的吏、徒数量多,请求能沿用此前秦始皇二十七年的做法,让其它有吏、徒的部门官吏带队捕捉,以确保能获得猿。迁陵当年要进献的禽鸟可能是较稀缺的品种。里耶秦简8-1562载:“廿八年七月戊戌朔乙巳,启陵乡赵敢言之:令令启陵捕献鸟,得明渠雌一,以鸟及书属尉史文,令输。文不冑(肯)受,即发鸟送书,削去其名,以予小史适。适弗敢受,即冒适。已有(又)道船中出操楫(楫)以走赵,夷詢冒赵。谒上狱治,当论,论。敢言之。”^⑤秦始皇二十八年七月,启陵乡在捕获一只明渠后,乡啬夫赵即令专人带上鸟及公文输送县廷。此事同样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但七月已经超出迁陵县起初令貳春乡捕捉明渠的期限。当年迁陵进献禽鸟可能有所延迟,不管是由于迁陵县期间一直没有捕足明渠,还是捕捉到的明渠出现死亡而需要补足,都反映出这种鸟雀的难得。然而,据貳春乡守行此前的上书,在他看来,捕捉猿的难度要远远超过捕捉这些稀有鸟雀。

猿猴的称谓很早就出现了,但起初两者并称,其实是指猿与猴两种动物。里耶秦简9-1005:“□□虎、爰、木(沐)侯(猴)、田□、豺、□□□。”文中的猿即与沐猴并列。猴经常下到地面活动,而且喜欢在人类居住区寻找食物,诱捕不是很困难。猿的习性则与猴有很大不同,它们居住于原始森林最上层,往往只闻啼声而难觅踪影,以致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带有神秘色彩。由于猿“动不践地,居常在林”,凭借设置罗网或陷阱都难起作用,古代有效的捕捉工具似乎只有弓箭。但猿行动相当敏捷,长臂猿“以钩形长手悬垂在树枝上,双臂交替作荡秋千状运动。单独一次荡越可移动3米,若连续跨越行进,每次荡越的

① 鲁家亮:《里耶出土秦“捕鸟求羽”简初探》,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沈刚:《“贡”“赋”之间——试论〈里耶秦简〉(壹)中的“求羽”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李兰芳:《试论里耶秦简中的“献”》,《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

②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3-44页。本文所引里耶秦简简文中以“9-”开头的均引自此书,不另出注。

③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45页。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

④ 郭世谦:《山海经考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⑤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359-360页。本文所引里耶秦简简文中以“8-”开头的均引自此书,不另出注。

距离可达9米。在行动中,身手极其灵活,疾如飞鸟”^①。《庄子·山木篇》称:“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桷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逢蒙不能眇睨也。”^②《吕氏春秋·不苟篇》载:“荆廷尝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最后只能请箭术高超的养由基射之^③。要想射中猿已经很难,想要捕捉活猿自然更加困难。宋人周密《捕猿戒》中记载传统捕猿术:“(猿)大者难驯,小者则其母抱持不少置。法当先以药矢毙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则以乳汁遍洒林叶间,以饮其子,然后堕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鸣而下,束手就获。”秦代是否已经出现这种捕猿术,我们并不清楚。但这种用箭毒杀母猿,而后利用母子情来捕获小猿的做法未免过于残忍,故而有许多人反对采用。周密亦提到其先君守鄞江时,以“取之者不仁甚”,“每严捕弋之禁”^④。

不同于捕捉禽鸟只是指派作徒承担。迁陵捕猿需要由官府组织,并且是官吏亲自带队进行围捕。里耶秦简8-207载:“□□佐居将徒捕爰。□□二、黑爰一。□百五十人·皆食巴葵。”简8-1559与此有关联:“卅一年五月壬子朔辛巳,将捕爰,段(假)仓兹敢言之:上五月作徒薄及最(最)卅牒。敢言之。五月辛巳旦,佐居以来。气发。居手。”《校释》指出:“8-207记‘……佐居将徒捕爰’,‘佐’前残画似是‘兹’。如然,这是假仓说明上薄牒的原因。”^⑤这两枚简中的人物与事件相同,记录的是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迁陵假仓守兹与仓佐居“将徒捕爰”一事。秦代管理刑徒的县属机构有仓与司空两种,前者管理隶臣妾,后者管理刑罚较重的城旦舂、鬼薪白粲与居赀、系城旦舂的隶臣妾。由于捕猿需要大量人手,而司空管理的重刑徒需要严格监管,让仓的官员负责带队深入丛林捕猿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前引简9-31中貳春乡守行以“捕爰用吏、徒多”,“谒令官有吏、徒者将求捕”,由简背的“仓□已付”看,最后可能也是让仓解决的人手。

迁陵秦始皇三十一年,这次捕猿动用的人力是“□百五十人”。因为简上端残损,不清楚具体是几百五十人,但至少有一百五十人。这应该是累积的用人人数。胡平生先生注意到,简8-1559中“文书发出的时间是五月三十日旦”,认为这里“总共只有三十牒”,而“五月有三十天,每天一牒加上‘最’,该一共有三十一牒”,就是因为“缺少了五月最后一天的数据”^⑥。迁陵假仓守兹让仓佐居在“将捕爰”的那天早上将不完整的当月作徒劳作记录交至县廷,可见他们已经预见到捕猿不是当天就能完成的,很有可能要在深山丛林中停留一段时间,无法每天回到官署。事实上,迁陵隶臣妾总共只有150人左右的规模,^⑦而且负担吏仆、养、走、守府门等劳动的隶臣妾不可能都调去捕猿,如果没有其他支援,迁陵仓其实没法组织一支150人的捕猿队伍。尽管如此,按照迁陵的劳动力规模,累积超过150人也已经算得上兴师动众。里耶秦简9-1116载:“廿九年□尽岁库及捕爰徒薄(簿)廷。”跟这枚签牌相对应的简册,当有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迁陵捕猿作徒的详细纪录。将负担某项劳动的作徒单独统计上报,已公布的里耶秦简材料中,除规模较庞大的田徒外,似乎也只有“捕爰徒”了。

这次捕猿的结果是捉获“□□二、黑爰一”,总共有3只,应该说收获不少。迁陵捕猿尽管是官府有组织的围捕,似乎也并非每次都能成功。里耶秦简9-205载:“及有(又)数遣子捕爰,出入三月□至。”

① 高耀亭、文焕然、何业恒:《历史时期我国长臂猿分布的变迁》,《动物学研究》1981年第1期。

②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99年,第553页。

③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654页。

④ 周密:《齐东野语》卷12,中华书局,2004年,第223页。

⑤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358页。

⑥ 胡平生:《也说“作徒簿及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26,简帛网2014年5月31日。

⑦ 里耶秦简7-304载:“已计廿七年余隶臣妾百一十六人。廿八年新·入卅五人。·凡百五十一人,其廿八死亡。”秦始皇二十八年迁陵隶臣妾在116-151人之间。简10-1170“卅四年十二月仓徒簿最”载,当月迁陵大隶臣积990人,小隶臣积510人,大隶妾积2876人,合计积4376人。平均到每天,隶臣妾大概是146人。里耶秦简博物馆等:《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中西书局,2016年,第164页、第197-198页。

《校释》指出:“‘月’下一字,原释文作‘矢’,或是‘矣’。”^①此字是“矢”还是“矣”难以确定,但从当时捕猿能采取的方法看,迁陵捕猿应该会用到弓箭等有杀伤力的武器。前引简9-3311载贰春乡上缴“黄爱皮一,黑爱皮二”,有可能就是在捕猿过程中将猿伤得过重,没有达到活捉的目的。而简文中的“数遣子捕爱,出入三月”,则说明简文涉及的这位人员,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曾先后多次被派遣去捕猿,却都无功而返。

二、猿的分布及对猿的认知

迁陵在秦代要进献的动物主要是各种珍稀禽鸟与猿。鸟羽可用于制造箭羽和装饰^②,迁陵作徒中很多都承担“捕羽”“求羽”的劳动,同时官府还有“买羽”及征收“羽赋”的行为。当时迁陵供应的鸟羽量相当大,里耶秦简8-1735载“廿七年羽赋二千五【百】”,简8-2501载“□敬入徒所捕白翰羽千□”。因此尽管进献的是珍稀禽鸟,但在迁陵民众求取鸟羽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捕捉到这些稀有的品种。里耶秦简8-1515:“卅年十月辛卯朔乙未,贰春乡守皐敢告司空主,主令鬼薪軫、小城旦乾人为贰春乡捕鸟及羽。羽皆已备,今已以甲午属司空佐田,可定薄(簿)。敢告主。”“捕鸟”与“捕羽”在这里是一体的劳动。迁陵也有安排作徒专门“捕鸟”的情况,如简8-2008载“一人捕鸟:城”。但从安排的人数来看,获得这些禽鸟并不需要大动干戈。捕猿则不同,迁陵每次捕猿动用的人力可以累积“□百五十人”,耗费的时间可能“出入三月”,而且还需要官啬夫、官佐亲自带队“将徒捕爱”,对迁陵而言,显然并不轻松。然而,捕猿进献却是迁陵每年都要进行的常规活动。从前引材料可以看到,迁陵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都有官府组织“捕爱”,其它年份估计也有同样的活动。迁陵地处武陵山脉腹地,秦代仍保持相当原始的自然环境,境内各种走兽众多,选择猿做为每年固定的进献品,可能与时人对猿的认知及当时猿的分布有关。

长臂猿是适宜南方生态环境的动物类型,在我国仅见于西南边陲与海南岛。历史时期长臂猿的分布比现在要广泛得多,但基本上也仅限于长江以南地区。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江水》载:“江水又东迳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此峡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貉兽渡汶而不生矣。”^③“三峡猿啼”是中国文学中表达旅人哀愁的经典意象,但从酈道元的记载看,三峡的猿啼声应该都来自江的南岸。由于人类的区域开发与气候逐渐转寒,我国历史上大象、犀牛等多种动物都有过大幅南迁的现象。酈道元生活的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的气候寒冷期,那么在相对温暖的秦汉时期,猿是否可能也曾有在黄河流域大量存在呢?事实上,长臂猿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热带动物,完全可以适应热带、亚热带以外的地区气候^④。与逐渐南迁的大象、犀牛等不同,可能有人类以来,长臂猿始终就未曾有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生存。学者梳理我国出土的长臂猿遗存,发现“早期的长臂猿遗存主要出现在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西北部,说明长臂猿较早出现在我国西南部,再向东部扩散”,“从长臂猿遗存出土时间看,在更新世中期就有较多分布,到更新世晚期达到顶峰,全新世并不多见,由此反映长臂猿分布在全新世出现收缩趋势”,“长臂猿遗存分布最北点达到江苏省泗洪县,最南点到海南省三亚市,最东点到福建省霞浦县”^⑤。泗洪县位于淮河中游,这已经是长臂猿分布顶峰时期的北界。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认为:“‘猿’字或许是来自楚地方言的外来词。”^⑥《诗经》中没有出现“猿”字,只有

①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二卷),第88页。

② 杨小亮:《里耶秦简中有关“捕羽成毳”的记录》,《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王子今:《里耶秦简“捕羽”的消费主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③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777-778页。

④ 周运辉、张鹏:《近五百年来长臂猿在中国的分布变迁》,《兽类学报》2013年第3期。

⑤ 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902页。

⑥ [荷]高罗佩:《长臂猿考》,施晔译,中西书局,2015年,第41页。

《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毛传称“猱，猿属”^①。而在屈原的《楚辞》中则多次提到“猿”。秦地并非不产猿。据一些明清方志的记载，秦岭在历史上出产过长臂猿，如乾隆《盩厔（周至）县志》卷10载：“猴，长臂者为猿，出南山。”而且秦在惠文王时就占领的巴蜀地区，历史上也有长臂猿分布。不过，向北延伸不是我国长臂猿在西南起源后的主要发展方向，这些地区历史上长臂猿的分布应该相对稀疏。根据文献记载地点的统计，20世纪前我国“长臂猿科分布地，从绝对数，按省级政区前6名排序为：广东省（有88地），云南省（有86地），湖南省（有78地），福建省（有68地），江西省（有52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有43地）”^②。秦始皇时吞并的关东六国范围中，只有楚国旧地有长臂猿分布。而且由于秦吞并六国时，现在的云南、福建、广东、广西尚不是秦王朝控制范围，加之迁陵所在的洞庭郡（今湖南西北部）处于长臂猿东扩的中间地带，这里很可能是当时秦王朝疆域内长臂猿最为密集的地区。楚辞《九章·涉江》：“入溱浦余彷徨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③屈原笔下的猿就来自武陵山区。由于屈原在政治与文学上的影响，这也会让洞庭郡的猿在秦代更受关注。

猿在南方很早就被豢养。《淮南子·说山训》“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高诱注“猿捷躁，依木而处，故残林以求之”^④。楚庄王为寻其猿不惜残林，说明了他对所养猿的喜爱。《淮南子·俶真训》“置猿槛中，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⑤，西汉庄忌《楚辞·哀时命》“置猿狖于楮槛兮，夫何以责其捷巧”^⑥，则反映出西汉时南方地区有较多豢养猿的现象。人们乐意养猿，希望与猿相伴，一定程度上与当时人对猿的认知有关。猿在秦汉人的心目中具有神秘特性，其修长的四肢常被认为是采气的利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称：“猿之所以寿者，好引其末，是故气四越。”^⑦到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中，猿不仅能够长寿不朽，甚至已能幻化为人形，与越处女比剑。与此同时，猿又被视为母子情深的似人之兽。《华阳国志》卷1载三国蜀汉将领邓芝事：“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见玄猿缘其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子拔其箭，卷木叶塞其创。芝叹曰：‘嘻！吾伤物之性，其将死矣。’”^⑧而继《九歌·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后^⑨，猿啸亦因其诗性之美而常出现在汉代文人的诗赋创作中。如西汉淮南小山《楚辞·招隐士》“猿狖群啸兮虎豹噪，攀援桂枝兮聊淹留”^⑩；司马相如《长门赋》“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王褒《洞箫赋》“秋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⑪。这种种美化猿的观念在汉代日渐明晰，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强化，其起源则应该在更早的时期。

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大墓出土有长臂猿骨骼，该陵园墓主被认为是秦始皇祖母夏太后。据报道，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出土长臂猿的陪葬坑K12是名副其实的珍禽异兽坑，北段陪葬的是“珍禽”，南段陪葬的是“异兽”，异兽从南到北依次是猓狨、豹、黑熊、绵羊及长臂猿^⑫。《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⑬夏太后去世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猿在当时是秦国皇家苑囿中用于观奇的动物。珍

①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1054页。

② 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第909页。

③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30页。

④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123页。

⑤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162页。

⑥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63页。

⑦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449页。

⑧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83页。

⑨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第81页。

⑩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33页。

⑪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65年，第245页、第354页。

⑫ 张哲浩：《陕西秦墓“珍禽异兽”坑发现已灭绝长臂猿新属种》，《光明日报》2018年7月1日第4版。

⑬ [汉]司马迁：《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中华书局，2003年，第2511页。

禽异兽此前在秦始皇陵及汉阳陵的陪葬坑都有发现,但均未发现长臂猿,可能是由于其稀少。不过,在秦汉皇家苑囿养殖的珍禽异兽中是肯定有猿的。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描述了上林苑中各种猿猴在树枝间嬉戏的姿态:“于是玄猿素雌,蜚蠊飞鸱,蛭蝮蠃螈,蜥蜴蝥蛇,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夭蟺枝格,偃蹇杪颠。”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郭璞曰:“玄猿,猿之雄者色也。素雌,猿之雌者色也。”^①上林苑的群猿估计主要就是来自长江以南的贡献。《三辅黄图》卷4《苑囿》载:“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②汉武帝扩建上林苑时,群臣远方纷纷贡献名果异卉,他们贡献本地的珍禽异兽亦顺理成章。当时江北王侯贵族的私人苑囿里也有来自长江以南的猿。《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江都王刘建“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遣建荃、葛、珠玕、犀甲、翠羽、蜃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③。猿在这里是作为奇兽,成为闽越馈赠给江都王的礼物。

因地献贡在我国源远流长,这既是表示地方对天子的敬意,也是使天子能够尽享四方物产,显示其富有四海的地位。在《尚书·禹贡》所载各州进贡的物品中,各地的特色动物是重要类别,如徐州的鱣珠暨鱼,荆州的大龟,梁州的熊罴狐狸等,都是贡献的对象。对于秦王朝而言,猿是来自远方的珍稀动物,而且是来自倾全国之力才得以吞并的楚国旧地,加之猿被赋予的神秘特性、伦理品质以及猿啸引发的审美情感,朝廷对于猿的进献应该是鼓励的。而在秦王朝起初控制的范围内,迁陵所在的洞庭郡又是猿的分布最为密集、猿的名气最大的地区之一,这大概是迁陵曾经每年捕猿进献的原因。目前所见迁陵官府组织捕猿的记录迟至秦始皇三十一年,这也有可能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吞并岭南后,由新占据的最南疆地区进献猿,更能显示秦王朝疆域的辽阔与帝国权威有关。

三、从捕猿看迁陵进献的性质

秦代迁陵县进献的物品种类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捕献猿与珍稀鸟雀外,见于记载的还有枳枸、冬瓜、干鲈鱼及锦缯等。里耶秦简8-855载:“下临沅请定献枳枸程,程,已。”简8-1022载:“献冬瓜,干鲈鱼。”简8-1751+8-2207载:“锦缯一丈五尺八寸。卅五年九月丁亥朔朔日,少内守绕出以为【献】□。令佐俱监。”鲁家亮先生认为这些进献的物品属于普通民众需要承担的“四时献”,并在探讨里耶出土“捕鸟求羽”简时对迁陵的进献物品做了梳理与分析^④。沈刚先生推断里耶秦简中捕献的“鸟”,其性质可能与“羽”一样是赋,“献”的本始含义虽然是贡献,但“至少在秦统一前后这一时段的‘献’,是一种接近常态化的税种”^⑤。李兰芳不同意“献”是税种的意见,并利用里耶秦简中关于“献”的职官、制度的材料,对秦代的贡献制度做了探讨^⑥。分析里耶秦简中的“捕爱”简,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对迁陵进献性质的认识。

鲁家亮、沈刚在分析迁陵的进献时,都提到汉初制定献费一事,认为是对进献的规范化。史籍中关于献费的直接记载只有一条,即《汉书·高帝纪》高帝十一年诏:“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即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⑦学界以往对于献费的解释存在很大差异,观点之一确实是献费看作置办献物的费用。不过已有学者指出,这一观点的根据主要是颜师古的注文,“诸侯王赋其国中,以为献物,又多于郡,故百姓疾苦之”。唐代土贡一般由州府按照规定采买,并由各州朝集使赴京朝献。颜师古是唐代人,他其实是用唐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31-3032页。

②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230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13《景十三王传》,中华书局,2002年,第2417页。

④ 鲁家亮:《里耶出土秦“捕鸟求羽”简初探》,魏斌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⑤ 沈刚:《“贡”“赋”之间——试论〈里耶秦简〉(壹)中的“求羽”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⑥ 李兰芳:《试论里耶秦简中的“献”》,《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

⑦ [汉]班固:《汉书》卷1《高帝纪》,第70页。

代的土贡制度来比附汉初的献费,因此他的注解并不是很强的证据^①。从里耶秦简中迁陵捕猿进献的具体情形看,进献与汉初的献费很难说有直接的关联。

献费是按人头征收的,其承担者是登记在册的普通民众,而迁陵捕猿使用的主要是官有劳动力。秦始皇二十八年的捕猿工作,迁陵县起初让贰春乡负责。贰春乡守行接到任务后提出乡“毋吏、徒”,“捕爰用吏、徒多。谒令官有吏、徒者将求捕,如廿七年捕爰”。“吏徒”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迁子》中出现过,整理小组注云“吏徒,押解犯人的吏和徒隶”。后来陈伟根据里耶秦简8-1517简文“疏书吏徒上事尉府者牒北”及简背所书人名,指出吏徒即史卒,“吏徒”之“徒”为兵卒^②。不管吏徒如何理解,在贰春乡守看来,总之他所管辖的编户百姓并没有捕猿的义务。秦始皇三十一年迁陵的捕猿由假仓守兹与仓佐居带领徒完成,他们带领的徒肯定主要是“仓徒”,即刑徒中的隶臣妾。里耶秦简8-2429因残留“□言之”,“□【隶妾】□”“□□赏责七□”,能判断是迁陵仓的作徒簿,其中“□人捕爰”,即是隶臣妾被安排捕猿的记录。捕猿之外,据里耶秦简8-1515“主令鬼薪軫、小城旦乾人为贰春捕鸟及羽”,简8-2008司空徒簿“一人捕鸟:城”,简8-2011都乡守是徒簿“一人捕献”,迁陵捕献鸟雀也主要由刑徒完成。李兰芳前揭文也指出判断“献”的性质时,要考虑具体承担任务者的身份。

西汉献费“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迁陵尽管进献的物品种类繁多,而且捕猿并不轻松,还远远构不成这么重的负担。人头税是汉代财政收入的大宗。通常情况下,汉代成年人每年出算赋120钱,未成年人起初每年出口钱20钱,武帝后加至23钱。献费的标准超出算赋的一半,更是口钱的三倍。即便按部分学者所理解的,只有户主或成丁才缴纳献费,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迁陵捕猿,秦始皇三十一年动用的人力累积达到150人。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载:“有罪以赏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③前引简8-207记载这些捕猿者“皆食巴葵”,按照官府认定的劳动力价值标准,这累积的150劳动力因为是“公食”,合计值900钱,折算下来只相当于汉初十四五人的献费。就算不止150人,除以献费额,也不会是太大的数字。至于迁陵置办其它的进献品,前面提到捕鸟比捕猿容易,很多鸟雀在求取鸟羽的过程中便可获得。秦始皇二十八年迁陵要进献的鸟雀中,明渠可能是较难获得的品种,但诸如白翰之类的鸟雀尽管别处稀缺,据里耶秦简8-2501“□敬入徒所捕白翰羽千□”,在迁陵却很普遍。迁陵进献的枳枸、冬瓜、干鲈鱼等应该也不难获得。里耶秦简8-455载:“贰春乡枝(枳)枸志。枝(枳)枸三木。下广一亩,格广半亩,高丈二尺。去乡七里。卅四年不实。”简8-1527载:“卅四年八月癸巳朔丙申,贰春乡守平敢言之:贰春乡树枝(枳)枸卅四年不实。敢言之。”迁陵对这三棵枳枸树的结实情况特别关注,大概就是因为这三棵树的存在,才将枳枸做为进献物的。进献的物品,从实用角度来讲,主要是满足皇帝及皇室成员的享用,往往不需要太大的量,故而总价值也不至于太高。

迁陵的进献不仅与汉初献费无关,似乎也谈不上是赋。前引简9-31秦始皇二十八年贰春乡守行的上书中提到迁陵“岁赋献”猿与鸟雀,这里的“赋”恐怕不能做赋税理解。“赋”其实也有“贡”的含义,《汉书·晁错传》“今臣寮等乃以臣错充赋,甚不称明诏求贤之意”^④,文中的赋便是指贡土。“岁赋献”大概就是“岁贡献”的意思。里耶秦简8-769:“卅五年八月丁巳朔己未,启陵乡守狐敢言之:廷下令书曰取鲛鱼与山今卢(鲈)鱼献之。问津吏徒莫智(知)。·问智(知)此鱼者具署物色,以书言。·问之启陵乡吏、黔首、官徒,莫智(知)。敢言之。”简文中朝廷要求各地进献鲛鱼与山今鲈鱼,虽然不同于主动贡献,却也不是强制性的要求。迁陵乡吏、黔首、官徒对这两样东西一无所知,自然也就无法进献。事实上,朝廷出于需要,要求地方进献物品并不奇怪。湖北省荆州出土松柏汉简57号木牍载:“·令丙第(第)九。丞相言:请

① 郭丛:《汉初“献费”新探》,《史学月刊》2020年第3期。

②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345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④ [汉]班固:《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92页。

令西成(城)、成固、南郑献枇杷各十,至不足,令相补不足,尽所得。先告过所县用人数,以邮、亭次传。人少者,财助。献起所为檄,及界,邮吏皆各署起、过日时。日夜走,诣行在所司马门。司马门更诣大(太)官,大(太)官上檄御史,御史课县留穉(迟)者。御史奏请许。制曰:可。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①汉文帝十年下令西城等三县进献枇杷,并要求通过邮、亭传递,途径各县如果人手不足,则需出钱补助输送。但很显然,西城等县的百姓并不会因献枇杷而较其它地区百姓有更重的负担,这里枇杷的置办与运输应属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进献的意义主要在于表达地方的顺服。《左传》记载僖公四年齐国讨伐楚国时,管仲历数楚王罪状,首先便是“尔贡包茅不入”^②,不按规定进献在这里成为出兵征讨的理由。里耶秦简9-2350载:“匚乏献罪不轻匚子轻。”“乏献罪”的存在,表明进献在秦代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简9-77载:“谒者日月有譴(譴)问,毋有此献行久矣,何”,可见平常进献的物品一段时间不再进献,也可能受到责问。但进献在秦代应该是地方政府的法定义务,尤其是郡政府,而非普通民众。秦朝虽然在政治上结束了战国分裂,但文化上的统一远未达成,地方顺服始终是朝廷最担心的问题之一。郡是秦代的一级行政区划,而且拥有较西汉武帝以后更大的军事、监察职能,郡尉以下,设有郡司马、郡候、郡发弩、郡司空、郡轻车等一系列地方武官,是镇压叛乱、拱卫中央的支柱,但同时也有反叛的实力。于是,由郡组织的进献,因其象征意义,当时可能尤其受到重视。

从里耶秦简的记载看,秦代迁陵县的进献就是由洞庭郡统筹安排的。临沅曾经是洞庭郡治,这里设有专门负责进献的献官。里耶秦简9-1162载:“匚子,临沅献官受迁陵少内【壬】”,少内是县廷管理财物的机构,这是在临沅的献官接收来自迁陵的进献品。简10-1170仓徒簿“女卅九人与史武输鸟”^③,大致也是将进献的鸟送郡城,再由献官进献给朝廷。里耶秦简8-855“下临沅请定献枳枸程”,则说明迁陵贡输枳枸的数量是由洞庭郡决定的,迁陵要捕献鸟、猿的品种与数量估计同样出自洞庭郡的安排。在秦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机制中,地方财政名义上也要归中央所有,但郡并非没有可自行支出的存留。《汉书·循吏传》记载西汉前期文翁为蜀郡守时,选郡县小吏“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同时“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赏计吏以遗博士”。师古曰:“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④郡少府可能源于中央的“少府”机构,但应该不是太守的“私奉养”,而是管理郡府能够自行支出的钱财。秦代由郡组织的进献,其置办费用可能最后也要归结到这里进行核算。

(责任编辑:徐定懿)

[参 考 文 献]

- [1]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 [2]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校释(第二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 [3] 鲁家亮.里耶出土秦“捕鸟求羽”简初探[M]//魏斌.古代长江中游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91-111.
- [4] 沈 刚.“贡”“赋”之间——试论《里耶秦简》(壹)中的“求羽”简[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4).
- [5] 李兰芳.试论里耶秦简中的“献”[J].中国农史,2019,(6).

① 朱江松:《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牍》,荆州博物馆编:《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②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91页。

③ 里耶秦简博物馆等:《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第198页。

④ [汉]班固:《汉书》卷89《循吏传》,第3625-3626页。